

民俗学： 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

吴效群 编

2014年中国民俗学会
河南大学文学院
“民俗学：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4年中国民俗学会、河南大学文学院
“民俗学：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民俗学： 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

吴效群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学: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吴效群编.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6

ISBN 978 - 7 - 5649 - 2032 - 6

I . ①民… II . ①吴… III . ①民俗学 - 文集
IV . ①K89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9650 号

出版人 张云鹏

出版统筹 侯若愚

责任编辑 舒慧敏

责任校对 索小锋

封面设计 侯一言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室

电 话 0371 - 60993151(人文社科出版分社)

0371 - 86059753

网 址 www. hupress. com

排 版 河南金河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422 千字

定 价 6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四个基要主义——民俗学多学科定位的学术根源	高丙中(1)
文学的民俗学研究	尹虎彬(4)
接续民间文学的伟大传统——从实践民俗学的内容目的论到形式目的论	吕微(12)
返回民俗学的实践理性起点	户晓辉(65)
“学科·本土”本位——当下中国民俗学应该面对的取向	郑土有(87)
卑微与伟大之间的转折点——对民俗学科价值的再认识	陈连山(90)
民俗学的学科属性探索与民俗学的当代转型	田兆元(95)
论中国民俗学研究本体的构成	陈金文(110)
共享·心性·交际花——民俗的变脸	岳永逸(121)
作为一门学科的民俗学:纠缠于技术想象与历史想象之间	吉国秀(132)
民俗的三种属性及民俗学的三个研究方向	吴效群(135)
基于现象学的民俗四要素研究	王凤娟(138)
日常生活转型与民俗学研究范式转换	周全明(148)
“生活转向”的解释学意图	胥志强(160)
中国民俗的特征及研究范式	王小块(183)
按社会语境界定民俗之“民”	黄涛(189)

民俗与民族主义——基于民俗学的考察	刘晓春(199)
现当代中国民间故事书写文本再现口头特征的历程	祝秀丽(219)
口头表演的诗学与政治学——关于“表演”的批评与反思	王杰文(235)
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南方史诗类型研究	杨杰宏(264)
20世纪上半叶通俗故事的文体特征及其现代性研究	侯姝慧(280)
民俗学三分法和四分法——瞿同祖和黄华节的论争	吴丽平(301)
东方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刍议——以北京大学为例	陈岗龙(310)
谁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者	张 勃(315)
民俗学与宗教社会学的关系——从民间信仰变“非遗”谈起	甘满堂(322)
能工巧匠必有故事可讲——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一文的读书笔记	刘宗迪(325)
以身体民俗学的眼光看中国春节	刘铁梁(339)
地域文化元素在全国性节日中的鲜明印痕(兼论民俗学的社会 科学取向)——以山东人与清明习俗的关系为例	刘德龙(350)
浪漫主义与德国民俗学	王霄冰(363)
金门五岳信仰考察报告——台湾东岳信仰调查与研究报告	
之一	叶 涛(372)
忧郁的狂欢——豫西骂社火的传衍之道	赵 文 王学文(388)
佛教中国化的民间与民俗化向度	唐忠毛(406)
河南省西华县信仰民俗空间的当代建构	李秋香(408)
宋—清婚姻礼俗的新变与总体特征——贞节、再嫁、财婚与 婚俗角色	梅东伟(422)
后记	(436)

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四个基要主义

——民俗学多学科定位的学术根源

高丙中^①

民俗学有近 170 年的历史，在理论和方法上积累了丰富的成就；民俗学的从业者来源广泛，却能够保持一致的认同。进一步来说，虽然民俗学者能够认同民俗学，但是对民俗学的学科定位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把民俗学定位于人文学科，有的则定位于社会科学，有的定位于人文色彩浓厚的社会科学，还有的定位于可以兼备社会科学一些属性的人文学科。民俗学是一个能够包容，也因而能够不断进取的学科。要认识民俗学的这些特性，建立有效的概念工具是必要的。本文提出从四个基要主义概念来认识民俗学的历史发展，一方面描述民俗学思想方法的多样性，一方面尝试解释民俗学的多种学科定位何以能够成立。

概括地说，支撑民俗学思维的有若干基要性的主义。我认为其中有四个基要主义最为重要，它们是形式主义、历史主义、整体主义、实践主义。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是以“俗”为中心的学术，整体主义与实践主义是以“民”为中心的学术。

一、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民俗学的学科化得益于文化形式主义。自己社会的民俗是公众所熟悉的文化事项，以其中一些奇风异俗吸引知识的兴趣是一方面，但是民俗学真正成为好的学问是靠对民俗的形式方面的解析或建构支撑起来的，如母题、故事类型以及后续相关的索引。“民俗学问题格”（调查所依据

^① 高丙中，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的民俗分类与事项分解)是民俗学形成期间的看家工具、品牌产品,虽说是以问题体系出现,实际上是民俗学的形式研究的结果。对于“俗”的界定是民俗学的对象生产的基础工作,而这一工作是以民俗模式的建构为操作进路的。因此,形式主义理应是民俗学技术工作基本的、核心的理念。

形式主义的成就奠定了民俗学的基业,也长期制约着民俗学全面、多向的发展。要让“民”回到学术的中心,形式主义就要从学科的中心让位,成为学科的工具、技术的部分。

二、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因为时间的连续性而有民俗(文化传承,传承的文化),但是时间的连续性不是历史,历史要由理念的发展阶段来决定。民俗,无论在发生学还是进行曲里,都是因为卷入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发展理念分期中而具有历史性。历史,有编年史(中国的二十四史),有理念史(黑格尔主义)。由时间的连续性而构成民俗,由时间在连续中的断裂或在断裂中的连续性构成历史,构成民俗学在现代历史性巨变中出现的必然性。

传承构成民俗,历史性构成民俗学的核心理念。民俗学上的一些争论,可以归为关于民俗与连续性、民俗与断裂性(断裂的必要性、必然性或破坏性)两种历史观的分歧。

三、整体主义

整体主义:英国绅士从碎片好古,到原始社会的文化清单,民俗以特定的社会为参照,作为生活方式而具有整体性。现代化进程冲击民俗,导致传统生活方式(民俗)的碎片化。遗留物说也是在背后有一种整体论的:“整体”是指向过去的形态,文化碎片仍然给人关于消逝的整体的观念(想象)。民俗学者把探询的眼光转向当下,必然是要在当下看到整体,生活世界、日常生活、民俗生活,都在努力寻找支撑民俗作为整体的可能。

民俗,从来不是作为观察对象的整体而出现的,在现代生活中民俗只是部分的文化。把支撑性概念延展到“民俗生活”,民俗的理念才承载整体性,

此时再需要下一级台阶,用“生活世界”的概念支撑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整体主义(整体观)。

四、实践主义

实践主义:人实现目的的活动是实践,民俗生活是一种文化实践,也是人的全面的实践的内在构成部分。实践主义把形式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精英学术拉到了现实生活,把民俗放到真实的人的实际交往(人际情感交流、经济的交换、政治的博弈)之中,各种商业交易、移风易俗、文化抗争都可以成为调查研究的对象。但是,对于有良知、有人道情怀、有理想追求的学者,研究民俗既是关心普通人的生活幸福,也是关联着人类福祉的公共事业,而不仅是一种学术。

五、结论

民俗学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还是一个能够同时作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学科?

我以为,实践主义优先的学者可以把它作为社会科学来开展,而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优先的学者会倾向于把它作为人文学科来建设。没有形式认知与分析的积累,没有历史的维度,无法显示你是在做民俗研究;不具备整体把握与呈现的方法与概念,你无法在当今时代进行民俗研究,无法把民俗研究当作经验事实的调查研究。这是各种民俗研究共同需要具备的。但是,某个或某组基要主义的优先概念将促使你选择人文学科的定位或社会科学的定位。

但是,无论特定的学者选择人文或社科的哪种定位,作为民俗学知识共同体,民俗学可能(在当前看则是必然)是同时具有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性质的学科。

文学的民俗学研究

尹虎彬^①

在民俗学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始终围绕以下一些基本问题展开讨论。关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如什么是民俗?什么是传统?如何界定民俗研究的范围?民俗为什么要作为一个领域来进行研究?谁有兴趣来对此进行研究?民俗研究这一领域的状况和历史是怎样的?民俗学是否能称为一个研究领域?民俗的负载者、拥有者和实践者是谁?谁是民俗中的“民”?民俗代表了什么?因此,学术史上出现了民俗作为遗留物的概念,把民俗作为前逻辑时代思维的遗留物来对待,探讨传统观念如何模塑了当代社会人们的观念。关于体裁样式的研究,主要关注民众知识的具体划分,探讨体裁样式的区别是否有实际的效用?这种区分对谁来说是效用的?分类系统与文化价值是否彼此关联?关于传承、传播有如下问题:民众的知识来自何处?它如何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它是如何移动的?移动过程中的障碍是什么?它在时空中移动的手段是什么?其结果是什么?民俗可以作为文化现象来研究。民俗是用来做什么的?它具有怎样的运行机制?民俗如何具有维系社会的作用?受到弗洛伊德学说和荣格学说的影响,学者们把民俗作为心理和行为现象来研究,探讨民俗对个体生活有何作用?如何起作用?我们如何去探讨其可能性?除了上述问题之外,类似“民俗是如何被创造的”这样的问题格外受到关注,这也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

为了民俗学的未来发展,我们需要了解民俗学研究的现状是什么,最近的趋势和争论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做方法论的比较,关注民

① 尹虎彬,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俗文化与现实世界,关注民俗与旅游业、传统和法律的关系,关注文本与语境问题,关注已有的争论和新的争论,关注方法论上出现的新的综合。晚近民俗学的新特点:首先,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传播和利用的学术史反思中,探讨其中所蕴涵的学术的、文艺的和历史政治的意义;民俗学逐渐脱离民族主义的束缚,向国际化迈进。其次,民俗学从以文本为基础的研究转向以民族志为导向的田野研究。人们试图在民众的言语行为中确定文本、文类和表演,研究民间叙事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同时关注研究者对于结构材料、建构意义所起的作用,注意研究者如何在田野作业中进行自我定位。最后,民俗学出现了综合性研究的新趋势,学理上向更加综合的非物质文化和口头传统转化。在文化遗产打造、展示和利用过程中研究国家及其知识精英与民众的互动和博弈,揭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俗学与民族国家力量相互交织,直到20世纪初,每个国家仍然在探讨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在方法论上以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为代表的传统模式得到充分发展。进化论、实证论、比较研究、传播学,再加上文本批评,这些便构成了芬兰学派的主要内容。该学说影响巨大,比如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的安德森即为一例。1910年阿尔奈和汤普森(Anni Aarne, Stith Thompson)民间故事类型索引(AT分类法)诞生。该系统晚近由乌泽尔(Hans-Jorg Uther)增补,成为阿尔奈—汤普森—乌泽尔(Aarne-Thompson-Uther)体系,即ATU分类系统。1934年芬兰成立民俗学档案馆,马尔蒂·哈维奥(Martti Haavio)担任首任馆长,他组织发起民间故事的搜集,他强调基于文学的一种理想,擅长母题的历史分析和类型学的异文研究。二战后民俗学开始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新民俗学,人们把行为科学引入民俗学文本的研究之中,逐渐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田野调查的资料上,学理上向更加综合的文化遗产和口头传统转化。晚近民俗学的新趋势主要受到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影响。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方兴未艾。口述史、性别研究也成为民俗学的话题,全球化的理论导向逐渐增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民俗学出现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趋势。20世纪以降,心理分析学、文化研究和结构主义都对口头传统研究产生过影响。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影响最为持久,它以故事的类型研究为主要内容,以文

本分析为手段,是民间文学的核心理论。口头程式理论的学术渊源主要是古典学、语文学和人类学。创立该学说的米尔曼·帕里超越了同时代人关于荷马的争论,通过他对荷马史诗文本的研究,发现了其背后的传承性和口头性要素。他将这种发现拿到前南地区的田野中重新验证,凭借着田野录制的1500种口传诗歌文本,艾伯特·洛德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了比较口头传统研究的新领域。90年代中期以后,口头程式理论已经逐渐与其他理论融合起来,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的一些基本思想,已经为帕里的后继者们所汲取。口头程式理论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概念,如程式和主题、表演中的创作、流布、传统与创新、作者和文本等,归结起来,它们都要放在表演层面分析。口头程式理论引起人们关注源于口头传统的古代和中世纪作品,提出了口头传统在结构层面的生命力,把语文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比较研究,其负面作用是以单一模式来应对所有的口头传统,强调机械论而损害艺术性。人类的交流方式随着历史的演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古代口耳传承到纸笔传书,从印刷术出现到现代报业的出现,从电话、电报到今天的电子传媒时代,人类交流的速度、频度、广度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接触越来越密切,空间变小了,时间延长了。电子技术使图像的重要性大于声音,使人们以有声语言与他人交流的欲望愈加淡漠。瓦尔特·翁(Walter J. Ong)总结了口述思维的特点,认为它是依靠记忆的、情境的、移情的、聚合的和保守的;而书写思维的特点是分析的、抽象的、创造性的。他认为,科学、哲学和文字交流要求口头交流所不具备的那种去除背景化。因此,没有文字就没有现代意义的法律、科学和经济。^①

二

“口头文学”是一个广泛使用和有效的概念。但是,口头文学是什么,它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机制等,仍然是学界不断探讨的问题。口头文学资料来源和采集资料的真实程度不断被重新认识。对口头文学的创作者和传承者的研究是20世纪以来民俗学领域富有创新的领域,民间文学的匿名性和集

^① W. J. Ong, *Orality and Literacy*, London, 1982.

体性的观点应该被反思。口头文学的题材样式成为跨文化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文化人类学的局内、局外观点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什么是口头文学?如何界定口头文学的研究范围?为什么口头文学要作为一个领域来进行研究?谁有兴趣来对此进行研究?口头文学研究这一领域的状况和历史是怎样的?它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研究领域?从术语的使用看学术的传统,“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大众文艺”、“口头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这些概念的提出都有其独特背景。口头文学创作者的社会地位对于认识口头文学有什么作用?从表演的层面来研究口头诗歌,这就需要有文本分析之外的田野作业。田野作业反映出口头诗学的实证主义的学术范例,它是就活态的口头诗歌的表演而采集证据的过程,这些证据包括研究者在现场记录的、观察和研究的、描述的口头诗歌的现实。田野作业是帕里和洛德学术上的一大特点。他们强调了在口头传统文学中挖掘西方文学遗产的神圣性。对口头文学的研究是与民俗学的兴起相关联的。许多民俗学的理论产生于19世纪。芬兰历史—地理学派试图通过对得自不同国家和不同语言的民间故事变体的追溯,找到它们的唯一的起源形式。其他一些专注于民间传承样式的学派,例如由奥利克(Axel Olrik)提出的“史诗法则”理论,以及由米尔曼·帕里、艾伯特·洛德和约翰·迈尔斯·弗里做了精细阐述的口头程式理论。还有其他一些理论,例如结构主义、心理分析、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女性主义和本真性研究。20世纪以来许多学者更加关注口头文学的内部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提倡共时的、动态的、现场的观察和研究,强调对活形态的口头传统的探究。这一切都源于对学术史的反思,是对19世纪以进化论为代表的一些大的理论假设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起,欧美学者对19世纪以来民俗学研究的许多观念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主要集中在口头传统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口头文学的创作与表演、作者与文本、传统与创新、口头文学的文本记录与现代民俗学田野工作的科学理念、民俗学文本与文化语境的关联、关于口头文学的价值判断、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双向互动、口头传承、书写传统和电子传媒的传播学意义等。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是跨学科的。这种反思不仅揭示了以往的认识误区,更预示了新的学科走向。

关于口头文学技法的探讨包括以下主要问题:民俗事象是如何被生产、

制作出来的？史诗歌手以及其他传统的负载者“学”什么？口头理论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关键问题如传统和多型性（Multiformity）？什么是一次表演，它的衍生物即结果是什么？帕里、洛德的“荷马问题”和表演理论等，主要关注解决这些问题。普洛普的（Vladimir Propp）《故事形态学》（*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对神话的结构研究等，主要关注民间文化作为可以分析的结构和形式。口传诗歌的学术史上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远没有解决。如一个目不识丁的艺人，为什么能演唱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故事的诗歌，能演唱几十万个诗行？口头文学的创编是否存在复杂的规则？至今仍有许多学者错误地认为“口头诗人的创作并无什么计划”，“口头诗歌是以‘松散’和结构上的不完整为特点的”，“口头诗人在开始时并不能看整个史诗的情节顺序”。^① 关于口传文学的创编，洛德认为史诗演唱者的每一次表演都是一种再创作，在歌手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文本、原创的文本或原型。歌手并不需要书面的文本，也不会担心他的歌会失传，听众也不会觉得有这个必要。口头或口头派生的文学作品不会像作家文学如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或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那样，具有相同的美学意义，它们也不应该具有这样的美学意义。^② 史诗的口头传统并没有演变成史诗的书面传统，而是越来越移到背后，移到边远地区，直至消失。^③ 民俗学有过文本为王的时代，也有表演为王的时候，口头文学的文本，那只是植根于人类行为的具体情境的一种浅薄和部分的记录，就像鲍曼所指出的：“我们所谓的民俗学诸多象征的形式，都具有其主要的存在形式，即人们的行为植根于人们的社会和文化生活。我们习惯上视为粗糙材料的口头文学的文本，那只是植根于人类行为的具体情境的一种浅薄和部分的记录。”^④

① Gregory Nagy, *Homeric Question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1996, pp. 13—37.

② [美] 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83页。

③ A. B. Lord, *The Singer of Tales*. Cambridge, Mass., 2000, p. 135.

④ R. Bauman, *Story, Performance, and Event: Contextual Studies of Oral Narrative*. Cambridge, 1986. p. 1.

三

在比较口头传统研究中,类型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类型学在一般意义上涉及文类、文本、母题等不同层面。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类型学研究旨在突破时间、地域、语言、文化的界限去寻求各民族文学现象在诗学品格上的类似。^① 口头传统研究流派纷呈,但有共同探讨的问题,即在“传统的”标签之下,什么是大家公认的形式?^② 民俗学各个流派大致围绕传承的手段和基本形式问题而产生。类型和母题便是这样一个基本形式。虽然它们有普遍性原则,但是,它们也具有历史的、民族的和文化的专属性。

以芬兰民俗学发展为例,芬兰民俗学先驱者主要关注《卡莱瓦拉》韵律诗和咒语,而后来的田野调查逐步添加其他文类的材料。即便如此,芬兰文学学会的民俗收藏在1900年仅20万项,到1930年这个数值上升到50万项。芬兰于1934年成立民俗档案馆,时至今日芬兰文学学会民俗档案馆的收藏已经达到400万项,在世界同类收藏中规模最大。为了处理收集者提供的原材料,档案馆采用了不同的分类系统。最主要的分类系统按照较宽松的文类群组。必须强调的是这个系统是在芬兰材料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包含了一些不具有普遍性(民族和文化专属)的目录。按照类型进行分类是在更精细的层面上经常使用的方法。民俗档案馆采用的文类分类系统是与档案材料的累积过程一起历史地形成的。其结果就是这个系统按照现代标准考量,不是特别的精确和有逻辑性,但它终归满足了几代研究者的需求。此外,还有民俗类型分类法,它是基于芬兰学者阿尔奈在1910年提出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而建立起来的。^③

① 周启超:《类型学研究:定位与背景》,《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3期。

② 尹虎彬:《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25页。

③ 以上材料来自于笔者对芬兰文学学会民俗档案馆馆长劳里·哈维拉提教授的访谈记录。关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著作主要有:阿尔奈的《神话人物索引》(赫尔辛基,1910年);安德列耶夫的《按照阿尔奈体系所编排的故事情节索引》(列宁格勒,1929年);《民间故事类型:分类及参考文献》(S. 汤普逊译注,第二版,赫尔辛基,1964年)。根据“AT分类法”而编撰的其他索引有《根据阿尔奈体系编撰的民间故事情节索引》(1929年),《日本民间故事类型和母题索引》(1971年),《朝鲜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79年)。专题索引和地区性比较索引有《格林兄弟故事索引》、《东斯拉夫民间故事情节比较索引》。

具体就史诗这一文类来说,芬兰学者劳里·航柯提出了关于史诗传统的三个背景,即全球的、区域的和地方传统的。^①古希腊或欧洲关于一个民族的时代、社会、文化的精神特质的观念,关于史诗英雄的观念,其有效性在一般意义上是跨文化的。史诗是那些“被放大了的”人类的范例和道德准则的来源。另一方面,从文化传统的层面来看史诗这样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文学文类,我们会发现丰富多样的史诗传统、异彩纷呈的史诗类型,那些来自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史诗,它们在文本类型、仪式和传播方式上有着许多可比性或者不可比性。欧洲文学是建立在《圣经》和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之上的。因此,欧洲文学中关于史诗的概念是基于古希腊史诗和后来的中世纪史诗而逐渐形成的。^②与此不同,东方文学中的印度史诗,它在内涵上是以印度文化传统为依据的。史诗被认为是以歌、诗、节奏性的散体来讲述故事的一种叙事,有些部分并不是吟诵的。史诗在所表达的文化价值观和史诗母题方面,显然不同于古希腊史诗。希腊史诗与英雄有关的母题,不同于印度史诗中与神有关的母题;而与神相关联的一些母题,又是南斯拉夫史诗所缺少的。荷马史诗关于奥林匹斯山诸神的观念已经超越了地方性的神祇膜拜的局限,成为城邦的、泛希腊的神的观念。希腊史诗经过了泛希腊化而趋于一个统一的史诗传统,经过文本化的过程而最终定型。而印度的两大史诗形成时代为公元前400年到公元400年之间,成文以后仍然在民间口头传播,而且与地方性的仪式相关联,与地方性的人们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和实际生活紧密相关。世界各民族或国家的口头传统非常不平衡。但是,业已搜集的口头文学体量巨大、类型多样。至少文类是多样的、演述是多样的、受众是多样的、社会功能是多样的。比如有一种假设,认为史诗是集团认同的特许证,但是,非洲史诗起到许多不同的功能。在中国,北方民族的

① Lauri Honko, *Textualising the Siri Epic*, Folklore Fellow Communications, No. 264.¹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 p. 28. 一般认为,英雄史诗是以高雅文体讲述的,它是关于传奇式的或历史性的英雄及其业绩的长篇叙事诗歌。劳里·航柯的定义强调了歌手和表演的要素,强调了一个民俗学样式与特定社区的文化联系。又根据印度史诗传统中的“超级故事”这一地方传统的语汇,深化了人们对史诗叙事特点的认识。超级故事是无数小故事的凝聚,其恢宏的形式和神奇的叙事方式易于多重意义的生成。《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伊利亚特》、《奥德赛》即属于超级故事。相对而言,单一故事规模小、具有完整的动机和真实可感的人类的情绪。在一个单一故事中,一个人的死去是一个重要事件,而在超级故事里,一个人的死亡只是统计学上的琐事。

② [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406页。

英雄史诗传统,相对南方民族的史诗传统,前者的演述传统相对定型,而后者与仪式生活紧密联系,同一个民族的史诗,仍然因为传统社群的不同而具有地方的和方言的差异。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对口头传统的发掘,以及20世纪后半叶世界各地重新发现的当代社会的口传史诗,都促使人们以文化多样性的观念改变以往对史诗和史诗传统的认识。世界性的、区域的和地方的传统话语,正在以不同的层面重构关于史诗的观念和研究范式。^①

文类研究属于类型学的基本范畴,类型具有历史的、民族的和文化的专属特性,在民众的言语行为中确认文本、表演和文类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对文类的概括都是基于作家文学的特点得出,但口头传统的运作机制归根结底受到语言规律的制约。阅读口头传统的好词典是没有出版的词典,而民众的言语行为是活的语言博物馆。打破既定的文类概念,在民众的言语行为中重新认识民众的叙事,从本土语言中获得信息,成为当下和将来民俗学研究的趋势,也检验着研究者对民俗的认识。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来说,语言学和田野作业是其优良的传统,打破既定概念,立足民众和本土,研究当下的现象,只有树立这样的理念才能真正完成专业的使命。下面一段话对于今天的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研究仍然是有意义的:“跨文化比较的领域是丰富和多变的,深度地方性研究的丰硕成果正在汇聚起来,对这一笔艺术财富的比较研究的时代已经到来。跨文化的文学理论要研究来自不同文化的口头与书写文学。另外,文本、文类或者文学运动,或者是与一种以上文化相关的特定的文学观念,这些都可以进行比较研究。这里涉及的各种关系和不同的观念是复杂的,但是它们的存在不能被否认,否则我们就不能公正地审视所要考察的文学。口头文学在文学研究中已经开始扮演一种非常重要的角色,因而也是一种更为体制化的角色。口头文学一旦被誊录或移译,人们马上就会面临跨文化问题的限制;在口头文学领域中,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的确具有一种重要的使命。”^②

① 尹虎彬:《史诗观念与史诗研究范式转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② [荷兰]米尼克·希珀:《史诗及其英雄——口头文学的跨文化研究》,米尼克·希珀、尹虎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史诗与英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接续民间文学的伟大传统

——从实践民俗学的内容目的论到形式目的论^①

吕 微^②

笔者的所谓“序”，实际上是一篇读后感，绝无作导读的奢望（原著的论述更流畅，也更华丽^③）。但是，如果读者不打算被我的先入之见所干扰，则可以翻过此序，径直进入户晓辉先生的大著之正文，待阅读了全书之后，于掩卷深思之际，再返回来，与我一起交换对原著的感悟与认知。我相信，每位读者，只要你悉心地熟悉了原著全书的整体思路和具体论点，都能够发表不同于我的理解和解释的独到感知。正是在不同感知的对话交流中，原著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才会得到充分的阐发。而这样的阅读、讨论方式，我想，非常适合于像原著这样的古典式一体系性（而不是后现代碎片化）的实践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理论著作。以下所述，皆为笔者对原著的粗浅理解和粗略解释，需要事先声明的是：即便“其中有象”，亦当挂一漏万。故读者应切记，如遇可观之处，皆因原著的启发或直接就是转述的原著本身；而若现穷途之哭（均在注释中以“愚见”点明），则必以笔者自身的闭塞。

一、自由目的是民间文学的发生条件

“民间文学”作为汉语学术概念，是从英文 Folklore（直译作“民的知识”，

① 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序。

② 吕微，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③ “华丽”乃金耀基评价杨庆堃的用语，只有褒义没有贬义。“《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可以称为现代经典的华丽的巨著，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被著名中国宗教研究大师欧大年称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是不少社会学者研究宗教的重要参考书。”金耀基、范丽珠：《序言：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见[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